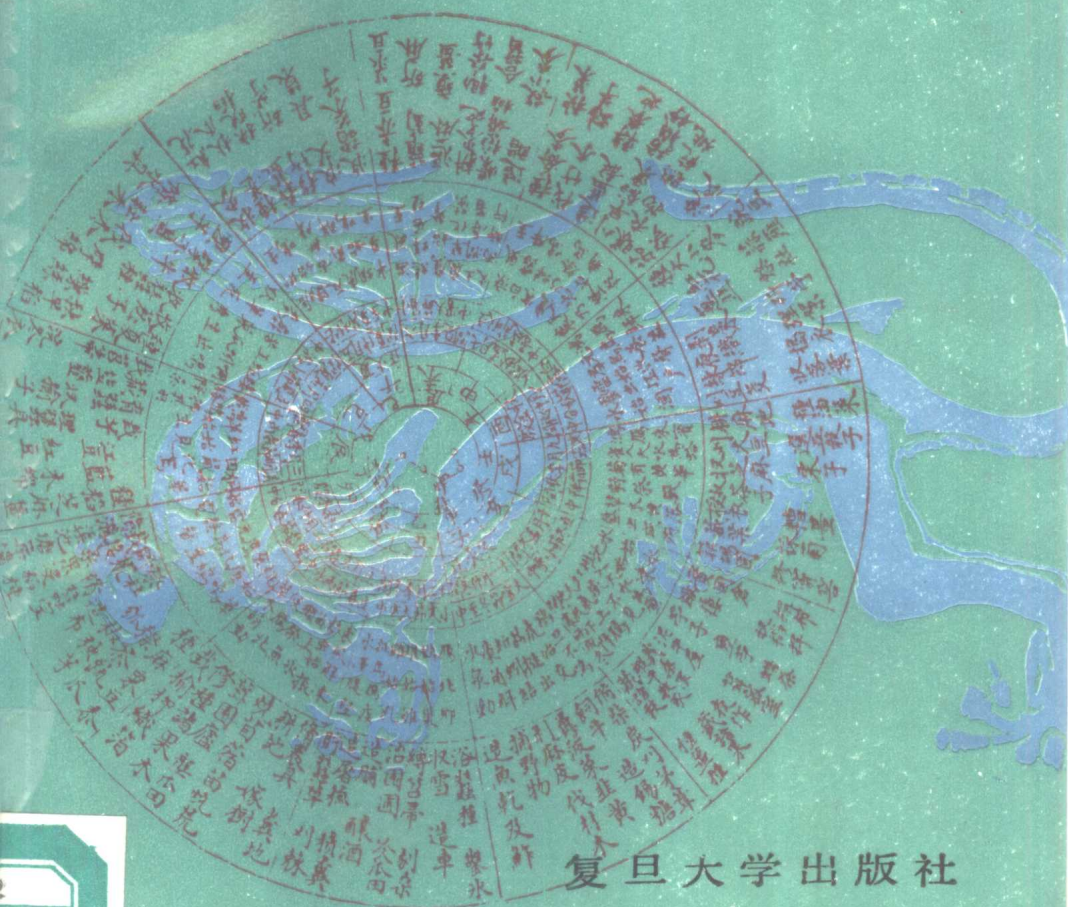


中国古代经济 管理思想

叶世昌 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F092.2
3
1

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

叶世昌 主 编

姚家华 副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徐惠平

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

叶世昌 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国权路 579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复旦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 字数 279,000

1990 年 7 月第 1 版 199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500

ISBN7-309-00426-4/F·88

定价: 2.55 元

本书编写者

叶世昌(主 编) 姚家华(副主编)

吴申元 徐培华 宋 源 施正康 钟祥财

前 言

中国古代经济管理^①思想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撰写本书正文前,有必要对研究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主要是宏观管理思想作一总的说明。

中国近年对古代管理思想研究的兴起,先是由于受到了国外的影响。国外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之所以感兴趣,是因为将其中的某些思想运用于企业管理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因此,国内的古代理管理思想研究也很自然地同企业管理结合在一起。

国内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应用于企业管理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不仅有学者写出了有影响的论文和专著,而且还有不少企业家对此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使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研究有了一定的群众性。一些企业家已经写出了在企业管理中运用古代管理思想的有质量的体会文章。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现在运用于企业管理中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还比较零碎,有的论著存在着贴标签式的缺点。这在研究的初期阶段是难免的,我们不能苛求于人。然而我们不能以此为满足,还必须进一步提高我们的研究水平。

① 经济管理可以有两种含义。一是指用经济的手段管理经济,如张尚仁说:“‘经济管理’这个概念,是相对于‘行政管理’而言的。指的是运用经济手段对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环节在内的社会再生产过程进行的组织、指挥、监督和调节。”(《管理·管理学与管理哲学》,第25页)另一是指对经济进行管理,而不问其是经济的或非经济(行政)的手段。事实上后一种含义更为流行,本书采用的也是后一种含义。

要提高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研究水平，就要对它作系统而不是零星的研究。要系统地研究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则不能忽视对中国古代宏观管理思想的研究。

在中国奴隶社会中，人们按其社会地位被划分为“君子”和“小人”。从所谓“君子劳心，小人劳力”的“先王之制”^①，到孟子所说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②，这种传统观念一脉相承。在儒家经典《大学》一文中，更向统治者提出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要求。以后，治国平天下成了有抱负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的信条。从治国考虑的管理思想自然主要是宏观的管理思想。不过有些宏观管理思想也可以应用于微观。

从治家出发的微观管理思想在中国古代也有一些。春秋战国时期的计然（或范蠡）、白圭的商业经营思想是众所周知的。由于战国时期产生了抑商思想并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思想，致使这方面的记载极为稀少。战国以来的农学著作，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一直连绵不绝，并有很大的发展。其中既有对宏观管理的要求，也有许多是用来指导家庭农业生产和经营的。此外，还有一些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总结治家经验的文献，也属于微观的管理思想。

既然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是以宏观管理为主要内容的，离开了对宏观管理思想的研究，就不可能了解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全貌及其主要特点，不可能对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作出恰如其分的分析。例如西方本世纪对人的行为规律进行研究，提出的理论被称为行为学说或行为科学。实际上中国早在先秦就对人的行为进行过深刻的讨论了，不过不叫行为，而是叫人性。商鞅、孟子、荀子、韩非都是这方面的专家。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西方的行为学说中国古已有之的认识上，除了能引起人们发思古之幽情外，是没有什么大意义的。问题在于，中国古代对人性的研究对管理究竟起

① 《左传》襄公九年。

② 《孟子·滕文公上》。

着什么样的作用。通过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就可以发现东西方存在着重大的差异。

中国古代的人性论是古代治国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研究人性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和稳定封建社会秩序。商鞅、韩非主张利用人们的好利本性，把人们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引向富国强兵的轨道，他们根本无视道德观念对人们的行为的约束作用。他们的主张虽然在秦国取得了一时的成功，却并没有带来秦国的长治久安。儒家的代表人物，包括具有异端思想的荀子在内，则认为对人们的求利活动必须加以道德（以“义”为代表）的约束（各人对约束程度的主张有差别）。西汉董仲舒说得很明白：“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①人性论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的地位是如此，单从微观管理思想的角度进行研究是难以得出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的。

研究中国古代的宏观管理思想不仅是研究方法的需要，而且也是为了给今天的宏观管理提供借鉴。其借鉴作用可以举出以下三方面：

第一，探索其规律。中国古代的宏观管理思想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这些思想有见诸施行的，也有未施行的；有施行得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其中必然存在着许多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探索这些规律，一定能为今天提供很好的借鉴。社会制度虽然不同了，但作为一个前后相承的社会，总存在着一些共性。特别是我们今天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共性也会更多一些。在过去社会中起作用的规律可能还在起作用。例如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每一王朝的财政负担总是越来越重，许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受财政状况的制约，许多宏观管理思想要涉及财政问题，许多当政者是在财政的压力下进行改革的。又如国家经营商业是中国封建国家取得财政收入的有效途径之一，但官营商业也会带来种

^① 《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

种弊病。所以唐宋以后的许多思想家既肯定国家经营某些商品(如盐、茶)的必要,又主张减轻国家垄断的程度,尽量发挥商人的积极性,以减少官营的弊病。这一些无疑具有规律性。研究这些规律供今天的宏观管理作参考,不会是毫无意义的。

第二,认清其影响。今天是昨天发展过来的,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是否喜欢,昨天的思想总是在悄悄地影响着今天。中国古代的宏观管理思想也仍然在某些方面起着影响作用。中国古代的贵义贱利、抑制商业等思想显然一度影响了解放后的政策,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这种影响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对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曾是一个不小的障碍。对于中国古代宏观管理思想在今天的影晌,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以免陷于盲目性。特别是对于那些封建性的糟粕,必须进行认真的批判,防止它继续成为我们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

第三,批判地继承。中国历史悠久,封建社会延续了两千多年,有些朝代长达数百年。这同中国古代宏观管理思想的丰富和成熟是分不开的。这种管理思想代表剥削阶级的利益,而且产生于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自然有许多已不适用于今天了。不过其中也有许多合理成分可以为今天所用。我们应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对它进行科学的总结,吸取其精华。从这个意义说,中国古代的宏观管理思想是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不能因为它是属于已经过去了的时代而不屑一顾。

要批判地继承,先要分清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分清精华和糟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对于同一种管理思想,可能甲认为是精华,乙认为是糟粕,见仁见智,各有不同。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可能有二:一、有些管理思想本身具有两重性,精华和糟粕并存。一定的限度内是精华,超过这一限度就成了糟粕。作为一种理想好像是精华,一付诸实施又成了糟粕。对于这样一些管理思想不容易作出较为一致的评价,例如《管子·轻重》的国家经营商业理

论，桑弘羊的盐铁官营、平准、均输政策以及王安石变法等就是这样。二、研究者本身历史观、价值观的差异，掌握史料的多少，对史料的不同理解，也会对管理思想的评价产生分歧。有分歧是正常现象，只有通过百家争鸣，才能在讨论中逐步求得统一。

评价中国古代宏观管理思想可以根据三条标准：第一，是否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第二，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第三，是否有利于改善人民的生产和生产条件。第三条是前两条的基础。人民的生产和生产条件改善了，社会秩序就比较容易稳定，生产的积极性就会提高，从而使生产得到发展。

一般地说，符合上述三条标准的就是精华。不过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即使是中国古代宏观管理思想的精华，也不一定为今天所需要。就以第一条来说，古代的宏观管理思想是以稳定自然经济、小农经济为目标的，这同今天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实现四化的目标已大相径庭。所以并不是说凡是属于古代管理思想精华的都要予以继承，而是要经过精心的选择、改造，使之适合今天的需要。

要批判地继承精华，并不是说就不要研究糟粕。有的同志担心多谈糟粕会造成人们对中国古代宏观管理思想的坏印象，认为一无是处，不利于研究工作的开展。这种顾虑是不必要的。精华和糟粕都是客观存在，只谈精华无助于树立对中国古代宏观管理思想的完整认识，甚至会导致精华和糟粕不分，把糟粕也当作精华来颂扬。这对正确地借鉴古代的宏观管理思想不利。我们今天还有批判封建主义的任务，批判中国古代宏观管理思想的糟粕是批判封建主义的应有之义。

以上一些观点是编写本书的指导思想。但作为一本历史著作，我们并没有在书中明确指出如何古为今用，哪些是今天可以借鉴的东西。一个善于读书的人，不难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以下举些例子说明中国古代宏观经济管理思想可以被今天所继承的

精华：

一、中国古代儒家的义利观，从总体上看是应予以批判的，但是其中也包含有合理因素，即应重视道德对人们求利活动的约束作用。“一切向钱看”对社会的发展总是不利的。在今天的社会中，只要改变“义”的含义，它仍有存在的价值。现在我们不是还常常批评“见利忘义”的思想和行为吗？加强道德教育，树立道德风尚，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二、中国古代的农本思想，在今天看来有片面之处，但是要重视农业生产这一点却是直到今天还适用的。农业是基础，轻视农业生产仍然要受到历史的惩罚。

三、中国古代统治者要考虑养民问题，即要使人民有适宜的生存条件，今天也同样是如此。但古代的养民主要靠土地，今天则不能走同样的老路，而是从实现四化中解决劳动力的出路。

四、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普遍主张富民，对此有很好的论述。今天也需要实行富民政策，只是阶级实质已经发生了变化。

五、中国古代绝大多数思想家都主张节用，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社会中很有必要。时至今日，我们仍需要提倡节用，当然不是说越俭省越好，而是指适合今天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节用。

六、中国古代思想家主张以薄税敛为实现富民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现在减轻农民和企业的各种负担仍是加速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七、中国古代思想家普遍主张实行量入为出的财政平衡管理原则，这原则到今天也还没有过时。

八、中国古代有由国家调节商品流通和物价的管理思想。这在古代主要是一种理想，在今天则应努力争取做到。

九、中国古代以国家经营商业为取得财政收入的途径之一。这办法到近代日益发展，直至今天也仍在发挥重要作用。

十、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提出了健全货币流通以稳定物价的

主张，宋孝宗的纸币管理思想受到后世的赞扬。健全货币流通，稳定币值，是各个存在货币流通的社会的共同要求。

以上只举了一些例子，自然不是中国古代宏观经济管理思想精华的全部，而且也没有充分展开。各种管理思想的具体内容可查阅本书正文。

本书第一章属于总论的性质，其余七章分述七个专题。经济管理思想的专题不限于这七个，但这是主要的专题。

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和中国经济思想史关系密切。我们在编写本书时充分利用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原有资料，也注意挖掘新史料。袁宝华同志在为《中国古代思想与管理现代化》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说：“发掘、研究我国古代管理思想，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工程。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毕竟还只是‘浅层开发’，刚刚起步。繁重的任务还在后头。我们要努力加强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深入挖掘’，以取得更大的成效。”^①我们虽然做了一些“深入挖掘”的工作，但要真正实现这个目标，还有待于同行学者、专家们的共同努力。

① 《一项伟大而艰巨的工程》。《中国古代思想与管理现代化》，《序》第4页。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中国古代宏观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	1
第一节 义和利	1
第二节 养民和恒产	9
第三节 富民和富国	21
第四节 生财和节用	31
第二章 农业管理思想	40
第一节 保证衣食需要和多种经营	40
第二节 农时管理	48
第三节 农业生产过程管理	58
第四节 以农治生和家庭农业管理	68
第三章 水利管理思想	80
第一节 水利和农业	80
第二节 筹集水利经费	88
第三节 估算投资效果	97
第四节 水土资源管理	104
第四章 工商业管理思想	115
第一节 工商业的地位和作用	115
第二节 手工业生产管理	122
第三节 市场和物价管理	131
第四节 商业经营管理	142
第五章 货币管理思想	152

第一节	中国古代的币制	152
第二节	货币管理的指导思想	158
第三节	钱币的质量和数量管理	170
第四节	纸币管理	179
第六章	财政管理思想	190
第一节	财政和经济	190
第二节	量入为出和量出为入	199
第三节	农业赋税管理	208
第四节	会计管理	220
第七章	盐政管理思想	233
第一节	中国古代盐政	233
第二节	榷盐的作用	242
第三节	盐法通商	250
第四节	禁缉私盐和盐价控制	262
第八章	人口管理思想	270
第一节	人口和国家盛衰	270
第二节	人口的数量管理	277
第三节	人口的质量管理	285
第四节	人口的流动管理	291
附录：	人物和著作简介	300

第一章 中国古代宏观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

第一节 义 和 利

利是人们所追求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①。人们无限制地追求私利，必然会产生利益上的冲突和对立。中国古代思想家考虑到这一情况，因此主张用德、礼、仁、义等道德规范对人们的求利活动进行道德上的制约。道德规范具有阶级性和社会性。它们产生于奴隶社会，而为封建社会所继承和发展。其中用来和利并称的主要是义。妥善处理义利关系问题是中国古代经济管理上的一条极为重要的原则。

早期的义利关系主张，可以用“义以生利”^②来代表。意思是说：人们的言行符合义的要求才能够产生利。显然，这是从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来看问题的。如果按统治阶级所规定的义的要求来思想和行动，人们就会安于自己所处的阶级地位，不会僭越，不会犯上作乱，使统治阶级获得利益；阶级地位越高的人，获得的利益也越大。另一方面，道德规范又反映了一定社会条件下人们对社会公德的要求，因此“义以生利”又说明义是使人们的正当利益不受侵犯的道德保证。但“义以生利”的提法把利说成是义的派生物，

①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3页。

② 《国语·晋语一》。

它没有正确反映物质条件和思想意识的真实关系。

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对利采取贬抑的态度。孔子说：“放于利而行，多怨。”^①认为人们无限制地追求私利造成了社会的动乱。他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②的观点，既美化了统治者“君子”，又表明了重义轻利的立场。他自己“罕言利”^③，反对“不义而富且贵”^④，还希望人们树立“见利思义”^⑤的美德。孟子批评“鸡鸣而起，孳孳为利”^⑥的行为，主张“何必曰利”而讲“仁义”。他认为讲利会使“上下交征(取)利而国危”，而讲仁义，“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⑦。这实际上是说讲仁义对国君有利，也就是“义以生利”的意思，只是没有把它明白地说出来而已。这样反对言利，就把人们对利的正当追求也否定了。

实际上，孔、孟并不是绝对排斥利。孔子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⑧。孟子提出：“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⑨他还指出人民只有“乐岁(丰年)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才有功夫“治礼义”^⑩。这无异说利是使人民接受义的先决条件。不过当他们从原则上考虑义利问题时，又把对利的追求看成是绝对的坏事了。

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先秦法家则根本否定义的积极性作用。他们认为人的本性是好利的。商鞅说：“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逸)，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故民，生则计利，

①② 《论语·里仁》。

③ 《论语·子罕》。

④ 《论语·述而》。

⑤ 《论语·宪问》。

⑥⑦ 《孟子·尽心上》。

⑧⑨ 《孟子·梁惠王上》。

⑩ 《论语·尧曰》。

死则虑名。”^①又说：“民之于利也，若水于下也，四旁无择也。”^②认为人的追求利益，就像水向下流一样。韩非把所有人人和人的关系，包括君臣、父子关系在内，都归结为利害关系。如对于父子关系，他说：“且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③因此，他认为：“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④他们都只相信赏罚政策的作用。商鞅提出了“利出一空（孔）”的方针，要把人们追求名利的活动限制在一条途径上。这条途径就是农战，使“利出于地”，“名出于战”^⑤，即积极发展农业生产的人可以得利，勇敢作战的人可以做官。韩非也主张“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贵，以过受罪，以功致赏”^⑥。

商、韩的主张实际上是强调了物质利益原则。这种主张适应了当时地主阶级富国强兵的需要，在秦国实行后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否定道德观念的制约作用，单纯用利来刺激人们的积极性，仍具有极大的片面性。秦王朝的迅速被推翻，和无视仁义等封建道德观念对巩固封建统治的作用不无关系。

荀子对义利问题作了较全面的论述。他认为每个人都具有好义和好利两种倾向，统治者的责任在于使好义战胜好利：“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上重义则义克利，

① 《商君书·算地》。

② 《商君书·君臣》。

③ 《韩非子·六反》。

④ 《韩非子·显学》。

⑤ 《商君书·算地》。

⑥ 《韩非子·六反》。

上重利则利克义。”^①

所谓义战胜利，并不是根本否定利，而是用义来制约利。荀子认为人具有维持生命和追求物质享受的各种欲望：“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食欲有刍豢(家畜)，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甚至“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也是“人情之所同欲”^②。但如果大家都追求欲望的满足，社会就会乱，所以他又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困)。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③这里的“礼义”包括法度和道德的双重意思。“制礼义以分之”的结果，既做到“养人之欲，给人之求”，又不至于因欲望的无限制而引起社会的争乱。荀子还认为有欲望并不完全是坏事，国家可以利用这种欲望，用赏罚政策来使“贤者”进，“不肖者”退，进而刺激生产的发展，使财货多得如“泉源”、“河海”、“丘山”^④。

《管子》产生于战国至西汉时。写于战国的《管子·牧民》中说：“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说明要使人民接受统治阶级的道德观念，先要使他们有较好的生活条件。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都懂得这个道理。孟子是懂得的，前面已提到过了。墨子说：“故时年岁善则民仁且良，时年岁凶则民吝且恶。”^⑤西汉的《淮南子》中也说：“夫民有余则让，不足则争。让则礼义生，争则暴乱起。……故物丰则欲省，求澹(贍)则争止。”^⑥这一类说法以后还有很多。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上述《管子·牧民》中的话。

① 《荀子·大略》。

② 《荀子·荣辱》。

③ 《荀子·礼论》。

④ 《荀子·富国》。

⑤ 《墨子·七患》。

⑥ 《淮南子·齐俗训》。